



E m p i r e o f C a p i t a l

资本的帝国

[加拿大] 埃伦·M·伍德 著
王恒杰 宋兴无 译

09



上海译文出版社

Empire of Capital

资本的帝国

[加拿大] 埃伦·M·伍德 著

王恒杰 宋兴无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的帝国/(加)伍德(Wood, E. M)著;

王恒杰,宋兴无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5

(当代学术思潮)

书名原文:Empire of Capital

ISBN 7—5327—3887—6

I. 资... II. ①伍...②王...③宋... III. 政治—评论—加拿大—现代

IV. D771. 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4043 号

图字: 09—2004—302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责任编辑 张占人

装帧设计 张志全

资本的帝国

[加拿大]埃伦·M·伍德 著

王恒杰 宋兴无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yiwen.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mm 1/16

印 张 9.75

插 页 2

字 数 128 000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7-3887-6/D·078

定 价 18.00 元

内容简介

是什么促使布什政府攻打阿富汗,即而又出兵伊拉克?又是什么影响着美国的军事战略和部署?本书指出,布什主义代表了帝国主义的一个全新品种,它由资本驱动,使得帝国得以通过纯经济手段实现全球统治。这一资本的经济帝国,要求一种全新的军事思想和战争原则,即一种在时间和目的上都有限制的战争状态。

作者以分析和历史的笔触,洗练地勾勒出一幅帝国主义的谱系图。同时,这种资本帝国主义的揭示,使得“全球化”首先变换为这样的议题:我们要批判的,是资本的全球化,还是资本主义本身?

作者简介

埃伦·M·伍德 (Ellen Meiksins Wood), 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 曾长期担任《新左派评论》编辑。其代表作有: 《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阶级的退隐》、《资本主义的起源》等。

总 序

东西方的接触，如果从中国丝绸进入罗马帝国显贵的生活算起，已有约两千年的历史。中国人认真看待西方人，并加以研究和学习的历史至少也有 150 年了。改革开放以来，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流和交往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和理解还有明显的玫瑰色，存在着某些认识误区。鉴于此，我国广大读者迫切需要一套理性地看待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客观准确地描述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丛书。

对于上述问题的共同理解，使在加拿大和美国的两位博士（一位社会学博士，一位历史学博士；一位中国人，一位加拿大人）走到了一起，并决心为改变这一状况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计划在第一阶段以组织翻译西方现有学术著作为主，重点使广大读者对西方社会政治文化有一个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挑选作品的标准是：1. 对西方现存问题有直接认识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学术著作；2. 讨论中国读者误区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的学术著作；3. 篇幅不大，但在西方学界有一定影响的最新学术著作。根据这几条，第一批出版的书目包括：埃伦·伍德的《资本的帝国》，乔治·里茨尔的《虚无的全球化》，约翰·福斯特的《生态学对抗资本主义》和乔姆斯基的《霸权还是生存》。

著名左翼理论家伍德认为，她这部篇幅为七章的论著既是对当前形势的政治回应，也是从总体上对资本帝国主义所作的分析性、历史性探索，包括从资本帝国主义产生以来，是什么“推动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发展，”是什么“使资本帝国主义区别于其他形式帝国主义”等问题。

因其学术著作（《社会的麦当劳化》）成为畅销书而著名的社会学家里茨尔对自己这本新书的评价是：本书在几个方面是建立在原有著作基础之上，但为了努力开辟一条研究全球化的新途径，又远远超越了它们。本书不仅把“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地化”明确区分开来，而且将两者与两个论题——实在与虚无——联系起来。

福斯特在《生态学对抗资本主义》中直接介入到当代政治经济领域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环境的争论，对上世纪最后十年间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环境危机采取的经济措施进行了系统批判，深刻分析和阐释了诸如资本主义与生态相悖的本质原因、生态与人类自由的辩证关系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等重大问题。

乔姆斯基是英语语言学界的泰斗，但近二十年来，他在西方世界却以抨击西方媒体、政治和政府更为著名，因此《霸权还是生存》一书封套上称他是“尚有争议的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在这里，乔姆斯基对美国的全球霸权进行了剖析，指出美国的单边主义、退出国际协议、国家恐怖主义和太空军事化与其谋求全球统治的动机是一致的。

在选择著作和实施翻译的过程中，许多西方学者，包括被选著作的作者和由于种种原因著作不能入选的作者都给予了我们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或为我们的中文版作序，或在百忙中为我们出谋划策，推荐优秀著作，或亲自为我们修改序言。上海译文出版社独具慧眼，大力支持我们的选题，并加快出版步伐，使丛书的第一批译著以最快的速度面世，在此，我们向他们和所有支持、帮助这一工作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选择书目和翻译过程中，我们的学术水平和认知能力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尽管我们本着对社会负责，对读者负责的认真态度，竭力做好，但不足乃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业内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宋兴元

平装本序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美国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之前。但当时的形势已经十分明了：假如发生战争，那么紧随军事占领的胜利而来的将是推行美国想要实施的政策。在本书中我提到了这一点。^[1]然而那时我相信——我现在仍然相信——对伊拉克的占领其目的并不是要把美国建成一个殖民帝国。美国的帝国主义仍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帝国主义，在本书中我力图对此做出解释。

布什当局的评论家特别强调它所代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次重大突破。毋庸否认这一集团鲁莽的甚至是自我毁灭性的极端主义，但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帝国幻景一直是二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全球经济霸权计划在大规模军事优势的支持下，随着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2]建立自己的经济霸权及在广岛、长崎施放原子弹，建立自己的军事霸权起就正式开始了。就其试图获取“全方位控制”的用心而言，由于美国拥有如此大的军事优势，无论敌友，都不会有人想要对其作为一种全球的或区域的力量进行挑战，布什当局无疑表现得更为单边主义和赤裸裸的。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全球性优势显然一直是美国孜孜以求的目标。

有评论家会说：由于对伊拉克的占领，布什当局正在返回到一种较为古旧的殖民帝国主义，这可能确实是一种重大的反叛。而这种观点

[1] 很遗憾，由于 Verso 出版社的失误，本书开头的一条脚注被遗漏了。在这个平装版中，这一失误被更正了。

[2] 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它是于 1944 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创立的一个国际货币固定汇率制度。——译者

在我看来是误解了美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其实，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也是对资本主义帝国的特殊性的一种误解。

美国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个资本主义帝国。这样讲并不是因为它是第一个拥有帝国的资本主义力量，而主要是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操控”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来控制整个世界。英帝国一直梦想在不付出殖民统治代价的前提下榨取印度的商业财富，而实际上，它是建立了一套较之于新型的资本主义霸权更接近于传统帝国主义的、以聚敛财富为目的的军事专制暴政。总体来看，美国所谋划的以及所实践的，就是无论在何地都尽量避免直接的殖民统治，而是尽可能依靠其经济霸主地位，因为后者相对而言成本更低、风险更小、获利性更强。

或许这样看这个问题是比较妥当的：美国意愿的仍然是维持其经济霸权而又不至于陷入殖民统治的泥潭。对伊拉克的占领这一事件本身就更加证实了这一看法。形势是如此地一目了然：把前伊拉克领导集团斩草除根，以留下一个基本未遭破坏同时又拥有一个较为听话的领导集体的伊拉克为目的的军事行动是徒劳的。美帝国政权无疑仍在希望它能够较快地而不是在更久之后摆脱困境，建立起自己的经济霸权，把美国资本牢牢地植入当地经济特别是其石油工业，使伊拉克取代沙特阿拉伯成为军事基地，却又不留任何公开的殖民存在的痕迹。

然而此处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就是本书的中心思想：尽管美帝国主义的目标是不含殖民统治的经济霸权，全球资本仍然——实际上比以往更加——需要一种高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社会、政治以及法律秩序。我们不断地被告知——不仅是被传统的“全球化”理论，而且也被诸如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的《帝国》这样的时髦论著——民族国家正在衰亡。^[1]但是，帝国霸权目前比以往任何

[1] 对于《帝国》一书的批评，请参见我的论文 ‘A Manifesto for Global Capitalism?’ in the collection *Debating Empire*, edited by Gopal Balakrishna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3)。

时候都更加依赖于一个由诸多的地方政权组成的有序的体系，而全球经济霸权则依赖于保持对维护全球经济的诸多国家的控制。当然，不存在任何一种全球政权能够像民族国家之于民族资本那样，来确保它所需要的秩序。同样，这样一种政权的产生也几乎永远是不可能的。通过国家间关系的中介，地方性政权在组织经济运行方面，发挥着不是更少，而是更多的中心作用。

资本主义的经济帝国主义模式是历史上第一种不仅仅依靠瓜分这块或那块领土、或者统治这里或那里的属民的帝国主义。它需要俯视整个全球的国家体系，并确保帝国资本能够安全、有收益地在其中畅通运行。它不仅要面对所谓的“流氓”国家或“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的问题。它还要保持附属国在面对剥削时的弱势。而且，更为有效的是，它还要建立那种使一个国家处于其他所有国家之上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因为，如果全球资本需要一个井然有序的多元国家体系，那么，很难看出它如何才能忍受一个不同国家间军力几乎平均分布的体系。

所以，现行的美国军事路线的首要前提就是美国必须拥有这样一种“任何势力——不论敌友——都不会寻求挑战，或自命为全球或地方霸主与之抗衡”的巨大的军事优势，这一观念的根源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其目的不仅是阻止进攻，而且也是为了“先发制敌”。总体而言，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接受了这一安排。然而一些主要的盟友确实表现的并非那么完全听话，特别是自从前苏联解体以来的情况更是如此。但是，鉴于全球资本的需要，美国的主要盟友——它们也一直是它的主要经济竞争对手——总的来讲还是同意美国应该拥有其巨大的军事优势，并不同程度地削减了自己的军事势力范围，这一点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就美国的举动而言，仍有一些方面需要进一步解释。也许，弄清楚全球资本为什么总体上需要一支占据优势的军事力量来维持一个有序的、意见一致的多元国家体系并不困难；但是，美国的霸主地

位怎样使得美国资本特别获得收益？这个问题就显得不是那么易于理解。我们当然知道美国资本为什么会热衷于某些直接的帝国干预，比如它对拉丁美洲的干涉。但是，要弄清楚美国的军事优势与其全球经济竞争中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关系绝非轻而易举。

比较容易说明的是：这种军事优势一旦存在，它就有了自身的生命力。当它没有特定的自我约束的动机时，情况就更是如此。我在此想说的是：就概念而言，鉴于其在维持全球国家体系中的宽泛的、非特定的作用，这种新的军国主义不会具有这样的动机。

由于它所享有的无人挑战的权威，我们几乎不用奇怪：美国会毫不节制地利用它巨大的军事优势追求任何一届政府在任何情况下认为是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特别是当它的经济优势不再像以往那样无人挑战的情况下就会更加如此。把这种权威的运用推向极限的只有乔治·W·布什。这里我要说的是：军事行为的过度总是打着全球资本自身“使命”的幌子，而无关乎美国历届政府是否是极端主义政府。

即使是美国的巨大力量也不能靠自身自动地拥有全球，因此下一个最佳措施便是定期的军事演习，但愿这样做仅是为了增加他人的信心。比如说，伊拉克战争或许难以把它说成是侵略伊朗的序曲，而相反，它只是避免这种冒险行为的一种努力。伊拉克作为一个合适的打击目标，并非因为它代表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而恰恰是因为它根本不代表任何实质的威胁。美国这样做无非是要在整个地区及全世界“敲山震虎”，而它自己（至少白宫的那些天才们会这样认为）则几乎没有任何风险。

军事剧场，或称“示威效应”成为美国军事政策的主要成分这个事实，使得预知下一步将要发生的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破解传统的帝国主义模式则要容易得多，因为其动机不外乎殖民统治和领土扩张。美国的对外政策越来越难以预知，是因为现今美国的军事行动与任何特定的动机日趋分离。经常地，与其说这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

的，倒不如说是为了显示其控制地位。我们可以预见的是以无限的战争为核心的帝国主义政策——不一定是连绵不断的战争，但一定会导致不论在目的上，还是时间上都没有任何限制的战争。

埃伦·M·伍德

2004年3月于伦敦

序 言

本书付印之时，全世界将仍在静观美国是否真的会因受到威胁而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其论调之强硬仍一如既往，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仍在继续。当然，这样的情况也并非没有可能性：布什当局一直寄希望于事态向可以挽回面子的方向发展——如一举拿下伊拉克，或者是萨达姆主动出走——这将使美国从一场越来越不得人心且极具灾难性的冒险中脱身；另外，与其表面态度相反，白宫对联合国调查行动造成的一再拖延求之不得。

但是，不论这一紧张局势以怎样的结果告终，布什当局清楚宣扬的政策都使我们陷入极度的恐惧，一方面是因为他强调要以压倒性军事优势确保在面对任何可能的挑战时能够抢占先机，不论这种挑战与对抗来自友方还是敌方；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坚持要拥有某种单边的“先发制人”的权利以应对任何可想像或不可想像的威胁。

自从这种布什主义于2002年9月宣布以来，自由派评论家们就典型地把它看作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总趋势的一次彻底决裂。当然，公然采取“先发制人”式的打击与美国在冷战期间或之后坚决奉行的遏制政策，以及在最坏情况下的报复政策是有着某些区别的。布什政权的这种倾向无疑把美国的单边主义推向了新的极端。它甚至有可能辩称：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珀尔轴心是一种具有明显险恶用心的极端主义的表现，它与美国政治的主流格格不入，遑论当局要员们在石油业的既得个人利益了。

假使说美国一直对这种旧式的帝国形式从总体上采取规避态度是因

为它风险过大、代价过高，而且事实上对于一个在经济与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大国而言也完全没有必要，那么，把布什政权看作一种正在趋近这种旧的直接殖民的帝国形式进行解读是不无道理的，尤其在中东问题上就更是如此。说到底，资本帝国主义所追求的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无需借助于政治统治而树立经济霸权；较之于其前辈们，布什政权在破坏上述一贯规则方面可能表现得更为彻底。

不过，即使我们把布什主义看作是美国对外政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反常曲折，即使我们忽略由美国实施的所有军事干预，即使我们不考虑此前历届政府大力推行“自由帝国主义”原则时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布什现象都仍然令人感到匪夷所思，除非把它看成一种至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对外政策固有逻辑的扩张，不论其如何极端，如何会最终招致自身的毁灭。而反过来，那种对外政策因其与政治、经济和军事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而根本不可能从资本主义更具普遍性的逻辑中提炼出任何特殊的意义来。

本书既是对当今形势的一个政治上的回应，也是对资本帝国主义所作的一般的分析性、历史性的探索，比如自其发端起关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动力与其他帝国形式的区别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诸如布什政府所追求的不可理喻的政策可能是某种极具典型性的疯狂；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这种疯狂不仅牢固地扎根于美国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中，而且也是牢固地扎根于资本主义的系统逻辑之中的。

埃伦·M·伍德
2003年1月于伦敦

导 言

任何人讨论美国的“帝国主义”问题，都很容易受到质疑：美国没有直接统治或占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没有。^[1]

这个事实的确是给“新帝国主义”定性的困难之处。今天，虽然仍存在着少数殖民性质的财源地，但不论是美国还是其他西方强国，都不是对广大的附属地进行直接控制的殖民帝国。尽管美国在约 140 个国家拥有军事存在，但仍不能说“帝国”直接以军队扶持傀儡集团的方式实施其统治，也不存在过去那种利用优势兵力或先进海军技术控制贸易通道的商业帝国。

帝国列强实施殖民统治，乃至对殖民地进行经济剥削，曾一度成为相当正大光明的事业。任何对南美的西班牙殖民者或后来在刚果的比利时殖民者有所研究的人都非常清楚，附属国的财富是以怎样的方式被转移给了宗主国。在这方面，传统的帝国主义与某些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有不少共同之处。正如封建领主与其赖以榨取劳役和地租的农民，或极权国家与其赖以征收税赋的农工之间那种一目了然的关系一样，殖民宗主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也是十分清晰的：前者动用武力进行征服直至实施种族灭绝，强迫后者放弃属于他们自己的财富。

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与劳动者的阶级关系相对而言就不是那么容易解读了。这里没有剩余劳动的直接转移，工人不向其雇主交付租金、税赋或贡品。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可以区分出工人们

[1] 这段话写完后不久，就有媒体报道了美国预计在战后占领伊拉克的种种计划。

自己得到了什么，同时被资本家夺去了什么。事实上，雇主们不仅未向工人们收取租金，相反，却向他们支付工资。而且，这种支付，最少在表面上，是对工人全部劳动的支付：例如，做八小时的工，就付给八小时的工资。工人们是怎样通过他们未获报酬的劳动创造了资本财富？换言之，资本家是怎样从工人的劳动中获得了比工人工资更多的、表现为利润的收益的呢？这个问题分析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对于任何一个理性人而言，不言自明的是：如果没有剩余劳动从工人转移到资本家手里，资本的积累就不会发生，但这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答案就远不是那么清晰简单。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对于解释这种转移的发生是颇具说服力的，但是用这样一种复杂的理论来解释它们之间并不复杂的相互作用却更加证实了劳资关系的模糊性。^[1]而向农民收取地租或赋税，显然就是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一部分给领主或国家——不论以劳役形式还是货币形式，根本就不需要如此复杂地对其进行理论化。

更为特殊的是，资本家未对工人施加任何直接的强制，那么，到底是什么迫使工人献出了剩余劳动？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在非资本主义社会，领主或国家直接动用政治或军事力量从生产者那里收取地租、赋税或贡品，而资本主义社会使工人为了工资而出卖劳动力的纯经济性强制却大相径庭。可以肯定的是，当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成为获得生存条件，甚至是获得劳动机会的惟一手段时，无产的工人几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但这种强制是非人格化的。这里实施强制的，或显得如此的，不是人，而是市场。表面上看，这似乎仍然是一个选择权的问题：封建领主与农奴之间是法定的主宰与隶属的关系，而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惟一正式认可的合法关系是自由平等的个人之间的交换——

[1] 简而言之，马克思认为：工人得到报酬是因为他付出了劳动力，而不是因为他的劳动成果。资本家支付工资购买了特定时期的工人的劳动力，因而就掌握了这期间该工人所生产一切，这些产品可供在市场上出售，其目的就是为了使资本支付给劳动力的部分与其从产品中获得的收益之差实现最大化。

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里我们不便深入讨论价值理论，或对代表资本家对劳动力剥削的剩余价值进行测算等复杂问题。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不论我们认为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转移的是不是“剥削”，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仍然是不清楚的，资本家榨取劳动者劳动成果的手段，不论对还是错，从本质上也是模糊不清的。

由于同样的原因，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也是不清楚的。想弄清楚“财富是如何从弱国向强国转移的”这个问题，现在要比早期殖民帝国时期更困难。然而，即使这种转移在有目共睹地进行着，那么，它是怎样完成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如同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一样云遮雾障，而这种模糊性又给人们留下了极大的争论空间。此处要特别强调的是，根本不存在直接的强制关系。形形色色的强制不是由宗主国（直接）施加的，而是“经济性的”，是来自于市场的。最后还要强调，惟一被正式认可的关系是法律上自由平等的两个实体的关系——例如买方与卖方，借方与贷方，甚至是名义上享有主权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使得阶级控制或帝国主义更具资本主义特征的是经济控制，它不同于直接的“超经济”强制，诸如政治的，军事的，或法律的强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帝国主义与超经济力量毫无瓜葛。首先，资本主义并不排除更多传统的强权殖民的统治形式。相反，资本主义的历史无庸讳言，是一部漫长的、血腥的侵略与殖民压迫的历史。而且无论如何，经济法则强大到足以取代旧的直接统治形式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 20 世纪才达到成熟。然而更为引人瞩目的是，即使是发展到最成熟的时期，资本帝国主义仍然需要超经济力量的支持。超经济力量对于维护经济强制显然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问题的难点在于：如同资本主义的阶级控制一样，超经济力量在资本帝国主义阶段中的作用也是模糊不清的。因为一般来讲，它不是通过直接干预资本家与劳动力、帝国与属国的关系起作用的，而是更